

УДК 327 (510+470)

DOI: 10.21209/2227-9245-2019-25-6-122-129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Е В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E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远东开发与中俄关系:新认知与新实践

**Цуй Хэн**,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 Шанхай
omelichkin.ov@mail.ru**Cui Hang**, East China Pedagogical University, Shanghai崔珩, 政治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博士后, 《俄罗斯研究》编辑

Отмечено, что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аспект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аличие спорных идей и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в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освоение обширных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азиат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измен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а ранней стадии освоен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имело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Практик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м регионом КНР и Дальним Востоком РФ в 2009–2018 гг.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обладает огромным потенциалом развития, что такж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ориентир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втор делает вывод, что в рамках стратегии со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иске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пути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тмеч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проблем низкого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в деловых кругах 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й открытости рын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摘 要: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事业是俄罗斯国家建构的重要一步。尽管围绕着远东开发战略的思路与政策仍然存在较多争论,但是开发东部地区的广袤边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在俄罗斯帝国开发远东的早期阶段,中俄在边境地区的合作对于今日两国在远东开发的合作具有启示意义。2009–2018年中俄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合作的实践表明,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合作拥有巨大空间,同时,也为未来的合作提供一定借鉴。中俄两国在战略对接的框架下,正在探索一条更为有效合宜和可以长期持续的参与路径。同时也需要克服企业界互信程度低、市场开放度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中俄关系、远东开发、经济合作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广袤处女地,乃是俄罗斯的百年梦想。十八世纪俄罗斯启蒙思想家罗蒙诺索夫对远东进行考察研究后,认为俄罗斯国家的强大有赖于西伯利亚和远东 [3]。罗蒙诺索夫的思想被不同时期俄罗斯决策层接受,并逐渐成为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共识。2012年普京总统第三个任期开始后,基于巩固领土、

实现东部与西部平衡发展、融入亚太快速发展区的战略考量,通过设置机构、出台法律法规等措施,大力推动新一轮远东开发战略。这一轮的远东开发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显现初步效果,远东开发进入稳定推进轨道。远东开发不仅对于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影响深远,对于中俄关系以及地区秩序重构,乃至新一轮全球化产生积

极作用。本文通过介绍中国关于远东开发问题的观点和有关争论,提供这一重要历史过程的另一侧面。

一、远东开发:不断深化中的俄罗斯认知

从冷战末期至新世纪初期,苏联和俄罗斯先后几次推动大规模远东开发,但是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效未达到预期,远东开发项目完成率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 [5]。在远东开发投入与产出比长期较低背景下,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始终提出开发远东,甚至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始后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

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远东地区没有体现出与其庞大的幅员、丰富的资源相匹配的地缘战略意义和巨大的经济价值。相反,苏联时期构建起来的远东工业体系崩溃,造成地区经济回归自然经济状态、人口向俄罗斯欧洲部分大规模流失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远东地区一度成为俄罗斯实现“强国”战略的沉重负担,延滞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建构的进程。

具体表现为:

首先,远东地区经济“造血功能”缺失增加了联邦预算的负担。

苏联时期通过工业化将远东地区纳入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中央政府以计划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但是苏联经济体系由中央计划分配资源和资本导致远东地区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也即远东地区在苏联解体后丧失了“造血功能”。在这一背景下,远东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现象,即美国学者所描述的“西伯利亚诅咒”现象。联邦政府为了保障远东地区社会经济生活运转,中央预算每年以预算平衡的方式向远东地区补贴超过3000亿卢布,增加了联邦预算赤字。而远东经济结构长期以来较为单一,高度依赖于原料经济,地区预算收入较少,吸引国外投资的能力较弱,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有限。2011年远东地区吸引的投资总额仅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的2%,远东地区对于俄罗斯经济的贡献与联邦政府的投入相去甚远 [2]。

第二,远东地区与欧洲部分生活水平差距巨大,影响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和社会心理稳定。

长期以来俄罗斯联邦精英将远东视为“前哨”,将西伯利亚称为“后方”。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民众和精英对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远东开发支持不足的问题素有怨言。远东地区曾经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也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心理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7]。远东民众用脚投票,迁移到国家投入较多的欧洲部分,技术人才流失进一步削弱了远东经济发展能力 [6]。

第三,远东经济衰退损害了俄罗斯经济空间的完整性。

苏联解体后经济快速衰退的远东地区与快速发展的东亚毗邻。在缺乏国家规划调控的情况

下,远东经济对于东亚国家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同一时期,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向着深度、广度发展。于是,在后苏联空间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方向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即欧洲部分与欧盟的一体化,远东对于东亚国家的依赖加强,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不利于稳固俄罗斯经济空间的完整性。

正是因为俄罗斯精英意识到远东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对于国家建构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巩固俄罗斯东部安全的现实需求,2011年以后俄罗斯有关远东、西伯利亚重新开发的讨论成为精英关注的热点问题,2012年普京总统就任后将远东开发列入第一批总统法案中。2012年至今,虽然俄罗斯精英关于远东开发争论仍未停止,但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已经将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远东、西伯利亚不再是抗衡西方的战略后方,俄罗斯精英将远东开发视为内部稳定以及固以及增加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只有欧亚空间的东西两翼达到了真正的均衡,俄罗斯才称得上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

二, 世界格局变化之下的远东西伯利亚

远东开发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一国内政的范畴,围绕着远东开发的讨论与总体世界发展趋势的问题紧密联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是以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意义的提升,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多样化存在将在思想文化上与欧洲-大西洋地区逐渐地趋于比肩而立,作为其主要特点的。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相当部分国家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其中,调控效果较好的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但是这一政策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以发展为明确目标的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经验对于俄罗斯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有一定借鉴意义。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自上而下、同时也自下而上地提供一个既有中央强劲支持、又能够获得社会和精英支持的有效远东开发模式,把握住亚洲崛起的契机。

远东重新开发并不只是资源和空间的利用开发问题,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可能的稳定增长势头与远东、西伯利亚之间的环境资源的高度互补性问题。远东开发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孤立主义在一部分国家重新获得支持。从这一角度来看,中俄两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邻国着力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同时,也全力推动邻国和邻近地区的更加走向开放,以此寻找新型的全球化的方向与内涵,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 [8]。

未来全球化存在多种路径,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方式,是基于各个地区和各种大国组合的具体情景,其路径、模式及其发展向度的多样化的,坚持市场、环境、资源相均衡、且公平和效益相兼顾的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模式,特别是新兴国家有可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多作用。2010

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2015年和2016新兴国家GDP增长速度稳定在4.3%的水平,2017年新兴国家GDP增速提高到5.2%。随着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份额增加,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在增强,具体表现为一些由新兴国家提出的地区合作倡议正在受到各国关注和参与。

未来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模态,也即,在强化国家建构、同时促进开放交流的背景之下的全球化进程,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地区发展与合作构架的建立和维系。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原有地区构架的背景之下,究竟是采用何种方式来建立新构架、取代旧模式,这里有着很多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和完全不同的新的构想。第一,是否有可能采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新旧过渡,显然已经不再存在重回革命的历史条件。第二,是否必要以冲突、特别是大国争霸的方式来实现这种重构,事实证明,历史上本无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世界之大,也完全可以避免采取冲突的方式,来实现利益的重组。第三,是否可能重回“雅尔塔模式”,以传统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划分的方式来实现格局转换?广大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当代世界中包括传统民主国家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的重趋关注,都意味着简单地“重回雅尔塔”不切实际。第四,是否有可能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方式解决“崛起德国”的方式,来解决非欧洲世界和非西方传统国家条件下新兴力量崛起的问题?虽然,其中有不少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是,超国家的、超越主权的一体化模式,不光在欧洲本身出现了强劲的反思和反弹,而且,在当前新兴经济体高度依赖主权和重视国家建构的背景之下,显然,简单使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新兴经济体崛起后复杂的地区乃至全球格局重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

在这一背景之下,上海合作组织所提倡的互相包容、多元发展、互利共赢、反对对抗的上海精神,显然使得这一新的实验,不光承载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与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实现“对接”的重要功能,而在这一国际参与背景下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本身,就是这一伟大历史试验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远东开发:国家振兴和走向大洋的“一体两面”

对于俄罗斯而言,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内部经济振兴与发展同亚太国际关系的“一体两面”的过程。在俄罗斯精英看来,当下乃是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参与亚洲事务的契机,主要是因为亚太地区所出现的新机遇和新格局,使得俄罗斯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

第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多元化、多极化的趋势正在深刻动摇传统霸权和过时的军事和意识形

态结盟关系,围绕着朝核问题正在出现的重大转机,中俄合作所推动的“三步走”路线图正在一步一步地得到实施。无论这一波的朝核危机的前景如何,它充分表达出新兴大国和相关方面的不懈合作,走向开放而不是坚持封闭,坚持和平而不是对抗冲突,这才是走向地区和谐的阳光大道。这是一个与远东、西伯利亚事务有着直接关联性的重大变化。

第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未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聚焦于是否能够实现与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长远的互补性发展;亚太地区发展模式的越益多样化,带来了互鉴互学的高度机遇,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实践中的努力创新也在引起世人的关注;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对于环境、气候、空间、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巨大需求,包含着对于远东西伯利亚发展开放的极高的期待。

第三、俄罗斯周边环境的变化,促使俄罗斯外交重心转向东方。不仅是由于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地区冲突需要有在东部亚太地区的缓和和突破加以平衡,而且,在亚太方向,俄罗斯在东亚拥有一定战略利益,俄罗斯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其拓展对外运作的空间。中俄美三边互动对于东亚事务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9]。俄罗斯有着广泛的外交与政治运作空间。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通过调整地区开发思路,推动远东西伯利亚的开放,促进东亚各国在远东开发进程中良性互动。

首先,俄罗斯已经意识到:没有必要再重复建设低东亚国家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部门。俄必须在亚洲继续工业化的同时,着力发展远东、西伯利亚具有竞争优势的技术含量丰富的产品、与俄发展水平相应的高技术产品、农产品、木材制品、电力供应等产业。包括将自然资源运用提升到新水平。在上述情况下,俄罗斯可以实现远东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国家产业结构,同时东亚国家也可以获取本国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和资源。

其次,在地区为主导的全球化新阶段,俄罗斯“最后的边疆(the last frontier)”不应是国家建构的阻碍因素,远东有能力成为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潜能所在。俄罗斯最大限度提高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抛弃所谓与西方竞争的“战略后方”、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前沿”这样的幽灵般的观念。作为具体的表象,在互动中俄罗斯对待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态度趋于开放,在2015年两国元首达成战略对接协议基础上,2017年冰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将远东西伯利亚的沿海地带纳入到战略对接的框架,2018年上合组织峰会元首联合公报再一次强调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措施表明俄罗斯一步一步接受“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主张。

第三,俄罗斯的远东开发不仅为当地年轻人提供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免使他们继续向东方或者向欧洲部分流动,而且只要有了一定的环境,

就会出现类似米哈伊尔·普霍罗夫这样的新型企业家出现。伴随着远东地区经济容量增加，远东对于周边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在增强。这里也包括吸引来自朝鲜的劳工，根据统计数据每年赴俄工作的3万余名朝鲜劳工中大部分在远东地区工作，俄罗斯也有意识吸引朝鲜、韩国参与远东开发，在这个意义上讲远东开发可以为朝核问题和平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

四、远东开发事务中的中国人的历史实践和认知演进

中国对于远东开发的认知有一个基于历史条件的长期发展过程。

第一、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

俄国获得远东土地之后，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垦荒和初步开发伴随着与中国（清帝国）经济关系的建立和调整。1858年的中俄《璦琿条约》（原称《璦琿城和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原称为《照会前换和约拟定条约》）客观上推动了中俄边境地区贸易发展。《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开启了远东地区中俄边境的陆路自由贸易。根据条款内容，两国民众拥有相对平等的贸易权利。为了扩大与邻国的经济联系，保障远东第一批移民的粮食与武器供应，沙俄政府通过《俄中陆路通商章程》（1862年），在中俄东段边境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将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全部开辟为自由港。到十九世纪末，经过长期发展，俄中边界和自由港成为远东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城市得以快速发展。

在俄国历史上的远东开发过程中，劳动力缺乏始终是一个严峻问题，特别是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劳动力需求特别迫切，这一问题长期掣肘远东开发进程 [10]。历史上俄国多次实施劳动力迁移政策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俄国欧洲部分和外国的劳动力向远东移民。而本国移民数量在面对拓荒和开发项目时，依然杯水车薪，因此，外国移民劳动力，尤其是中国人，在远东开发的早期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人吃苦耐劳、纪律性较强、人工成本较低等特点，大量中国人以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身份被雇佣到国家机关之中，如基建（修建公路、西伯利亚大铁路、港口）、采金、海军和陆军部、内务部等部门。在农业领域，中国人和朝鲜人成为主要的粮食生产者。他们引进水稻，种植小米、玉米、蔬菜等作物，酿酒，不仅解决了居民粮食短缺和军需食品保障问题，还把农垦技术传授给了当地俄国人 [11]。

通过回溯远东开发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众在俄罗斯帝国开发远东的早期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中国移民为早期的远东开发提供了劳动力保障，缓解了欧洲移民不足问题对开发远东的阻碍，并且，相对于来自欧洲“惩罚”移民，中国移民的劳动积极性更强；其次，中国也是俄国欧洲地区生产的棉织品、金属制品、煤油、火

柴，以及远东地区生产的毛皮、鹿茸和海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关于远东历史的讨论绕不开领土争议问题。中俄两国于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2004年签署《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标志着中俄边境线走向全部确定。可以观察到，在处理涉及到领土争议的敏感问题时，中俄两国尊重现状，以务实、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解决一度引发两国兵戎相见的领土争议问题，为日后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对于当前俄罗斯远东开发的认知。

中国政府和知识界充分认识到：远东开发是俄罗斯长远战略、世纪工程，对于实现普京总统“强大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官方、知识界普遍认为2013年俄罗斯政府公布的《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规划》是远东开发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以全球化视野，立足远东地区的资源与地缘优势，通过发展新型经济、对外开放，加快俄融入亚太，以保证俄出口市场多元化，防止国家对远东地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下降，遏制远东地区人口下降趋势，以维护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

中方媒体广泛而经常地介绍：为保障落实远东开发战略，这一轮远东开发在政策工具方面取得了突破，一些制度创新值得周边国家借鉴。具体表现为：为了克服既往行政壁垒，打破“条块分割”，实现既定目标，俄政府不惜突破现行体制，成立远东发展部，由其负责协调国家计划和联邦目标计划在远东的实施情况；组建远东发展公司，负责港口、道路、通信、机场和地方航线的建设，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综合使用“赶超发展区”、“海参崴自由港”等措施，改善远东地区投资环境，改变远东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在远东开发机制创新反映出俄罗斯远东开发思路的调整，“赶超发展区”与“海参崴自由港”建设同步进行意味着俄罗斯新一轮的远东开发中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开发的互补性，西伯利亚大铁路现代化改造、“滨海”交通线路建设、沿海港口建设等配套设施建设标志着远东开发同时具有内部边疆开发和出海通道建设两大功能。

中方舆论也充分认识到：远东开发为实现中俄经贸战略目标提供新平台，远东开发战略与中国东北振兴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有许多契合点，欧亚交通走廊建设、北方航道开发、亚欧通信网络建设既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点，又是远东开发的优先方面。这一轮远东开发进程恰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相契合，中俄双方经过交流磋商，于2015年发表了《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宣布发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远东开发可以成为落实中俄战略对接的平台。中国积极参与远

东开发既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又可以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内涵。

第三、对于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关系发展

中国官方和知识界以积极稳健的心态看待俄罗斯与日本、韩国开展合作。

俄罗斯是中国最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日本是中国地理上的近邻，总体上说，中国欢迎日俄关系的改善，日俄关系缓和有利于改善东亚地区形势。中国能够从关系调整中取得更多发展机会，包括在远东地区开展更为深入的多边经济合作。日俄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或者日本将疏远其他东亚国家，相反日俄关系的缓和，也应该有利于中俄等地区重要国家相互关系的发展。

五、中俄在远东开发合作的实践

苏联解体至今，中国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互动先后经历了由“自发”阶段到两国推动毗邻地区合作，再到战略对接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边贸为主导的“自发”阶段

苏联解体之后，远东地区经济萧条，远东居民的衣食住行不得不依靠与邻国的经贸合作，大量中国商贩因此出现在远东地区。1992-1993年，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的贸易额达到21亿美元。1993年，中国占远东地区对外贸易额的90%。1992-1994年间，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对外贸易总量的50%，远东经历了短暂一段“中国快感”时期 [4]。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出现满足了远东居民的生活需求，对这一时期远东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九十年代每年进入远东地区的中国劳动力从万人上下增加到2万人左右，新世纪以来，在远东地区务工的中国人长期稳定在3-4万人，中国移民依然在为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做出贡献。严峻的人口形势和短缺的人力资源制约着远东开发进程，因此，中国移民填补了远东开发劳动力不足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劳务移民在远东农业、建筑业、能源开采等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中国商品是远东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国移民流入能够保障中国商品的供应，满足远东居民的消费需求。

这一时期，中国和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经济互动主要表现为边境贸易，实现载体为大批穿梭于远东和中国之间的商贩，他们在中俄边境地区开展较低水平的边境贸易，因为缺乏足够的外汇，甚至有时表现为原始的易货贸易。苏联解体初期中俄边境贸易有一定积极作用，中国商贩带去的大量生活物资缓解了远东地区民众生活困难的窘迫局面。

然而，这一时期中俄在远东地区的经济互动主要是民间行为，两国政府对于当时的边境贸易缺乏管理和引导，导致中俄边境贸易的自发性特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中俄两国部分商贩不端的个人行为在特殊的传播条件下，被放大为中俄两

国商人的群体印象，乃至在两国民众心中产生了偏见（刻板印象），并进而影响到了两国民众最初阶段相互形象塑造过程。这种恶劣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两国商人之间互信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毗邻地区合作

为协调实施中俄地区发展战略和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与俄罗斯《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中国和俄罗斯于2009年开始实施《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中俄两国在两国政府层面以毗邻地区合作的形式推动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的合作开启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特点是两国政府直接参与，以大规模项目投资的方式实现中国参与远东开发进程。

中俄区域合作的初衷是希望充分利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理位置毗邻、经济联系密切的地缘经济优势，加速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发展，从而更加密切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巩固两国的双边关系基础 [12]。

2009年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方合作项目规划时，俄罗斯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各联邦主体、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分别申报各省（联邦主体）计划实施的重点项目。最初两国各省级单位共申报208项重点项目，其中97项位于俄罗斯境内，总共需要440.3亿美元；111项位于中国境内，计划总投资额98.7亿美元。项目清单中共有70个项目涉及到与建设边境地区和跨境基础设施以及设立中俄两国合作园区：其中20个项目中俄两国共同参与，包括同江大桥工程在内，均为大型国际合作项目，19个项目位于俄罗斯一侧，总投资超过400亿美元，位于中国一侧的项目有31个，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

尽管，中俄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在推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合作项目上投入了巨大精力，但是项目实际落实情况远低于预期。截止到2016年原定计划中俄罗斯境内共有10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共479亿美元，最终在俄罗斯境内实施25个项目，总投资额117.7亿美元，项目完成度28%。中国境内列入计划的总共111个项目，计划总投资额98.7亿美元，最终落到实处的项目共计42个，总投资额61亿美元，项目完成度62%。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俄方的项目中仅有8个项目吸引到中方17.7亿美元投资，而中方的项目中仅有一个项目吸引到俄罗斯6.3亿美元投资 [13]。这一情况表明，两国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合作框架下落实的项目主要为两国国内单独投资的项目，而真正中俄合作的项目较少，也就背离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通过合作，密切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巩固两国的双边关系基础的本意。

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俄双方关于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方合作的设计思路差距较大，当时，中国项目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便

加大进口俄罗斯资源的能力，俄罗斯主张更多的发展原料深加工相关产业 [14]。事实上，在项目开始运行之后，中俄两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设计思路上的差异，中国发改委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曾于2011年考虑在贝加尔经济论坛框架下进一步调整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合作项目，但由于两国当时的需求差异较大从而导致未能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当时中俄两国市场开放度正处在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在开放度有限的背景下，两国合作深度受到制约，在客观上影响了两国企业参与对方的大型项目 [1]。

第三阶段：战略对接阶段

2015年5月8日，中俄两国发表了《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对于推动地区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作为优先领域将扩大投资贸易合作，促进相互投资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实施大型投资项目，共同打造产业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等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实施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

2015年10月28日，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远东联邦区联邦主体边境地区发展纲要》，具体规划了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和贝加尔地区与中国东北等邻近地区开展跨区域合作的目标、任务与措施。俄罗斯优先促进发展国际运输走廊。使它与东北亚运输网络一体化，建立有利的投资和商业环境，以扩大对过境运输的需求和发展相应的运输基础设施。

在2017年1月中俄两国决定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建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以协调和推动中俄两国区域合作。

战略对接阶段与2009年开始实施《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规划合作纲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前中俄两国在远东开始开展经济合作更加符合两国当前的迫切需求。随着2015年以来中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中国已经度过原材料需求高峰期，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输出产能的关键时期，向周边地区转移制造能力是当前的迫切需求。俄罗斯在经历2014-2016年经济危机打击后，着手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以“进口替代战略”为指导在远东、西伯利亚着重发展制造业，减低经济对于原料产业的依赖。因而在战略对接时期，中俄两国的需求恰好相互契合，这也是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开展高水平产业合作的先决条件。

现阶段中俄远东开发以及更为广泛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方面优先发展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其中有着中俄两国的考量。中俄在实践战略对接时优先选择基础建设，而没有选择以市场一体化为指导思想的欧盟模式，原因在于贸易规模和结构等结构性问题的制约。中俄两国贸易额近年来增长快速，2017年已经突破800亿美元大关，然而与中美、中欧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贸易结构上来看，中俄两国贸易以大宗贸

易为主，两国相互直接投资规模相对有限，中小企业之间合作较少。在现有的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条件下，中俄之间市场一体化缺乏与之相匹配的人员、资本、市场和服务流动规模。而且，市场一体化涉及到两国主权让渡的敏感问题，谈判本身需要较长时间。与之相比，更为务实的“互联互通”建设在当下更具有可行性，也更容易取得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两国贸易水平和规模方面具有巨大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9月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普京总统特别强调，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中国对远东地区的投资额达到90亿美元，占该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80%。

看到中俄两国在远东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前景的同时，仍需要意识到远东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参与远东开发仍然有许多长期存在的障碍急需克服：

首先，中俄两国商业界之间相互了解不够，互信程度较低，影响两国企业家扩大合作规模。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SPARK统计，2014年到2016年俄罗斯经济遭遇严重危机对于中国在俄企业增长没有造成明显影响，2013年中国在俄罗斯注册企业数量为378家，2015年为693家，2017年达到702家。由此可知，宏观经济状况并不是制约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关键因素，真正影响中俄两国合作深入是微观层面的互信度较低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16年3月和2017年11月两次大规模田野调查访问了长江经济带沿线从事对俄贸易与投资的中国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出中国企业家对于俄罗斯同行信任程度不高的现状。两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相关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改善这一状况。今年11月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将举办中国投资者日活动，促使两国企业家直接对话，加强交流。

第二、中俄两国市场相互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落实过程中反映出来两国市场相互开放程度不高的问题，现有的投资和经贸领域达到饱和后要求中俄两国政府加大相互开放市场的力度。尽管近年来中国在俄罗斯整体注册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中国在远东局部注册的企业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自然人和法人总共注册了90家，2015年注册了162家，2016年注册124家，2017年注册125家。固然，远东地区人口较少，市场容量有限，但是市场开放程度有待提高是制约因素。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远东地区拥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肉类、水密集产品并非所有种类均可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也无法进入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制成品销售等下游部门。中俄两国政府在扩大市场开放度方面正在做出一些制度创新，例如，2018年2月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晤时提到在波格拉尼奇内（俄滨海边疆区）-绥芬河（中国）建立新跨境超前发展区的

问题,在新的超前发展区内中俄两国入驻企业有权不受限制的向双方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

总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关乎俄罗斯国家建构的重要一步,虽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战略合作,很难寄希望短时间内取得大规模突破性进展,但是开发东部地区的广袤边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中俄两国在战略对接的框架下,在远东地区合作前景广阔,中国也在探索一条更为高效的参与路径。

未来两国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合作方面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包括:

(1) 中俄两国应当加强对于现有合作项目执行的总结与检查,重视项目落实情况,政府和学界有必要共同探讨为何会出现类似于中俄东北地区和远东合作之间难以接轨的深层原因,寻找解决途径。2018年2月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与中国政府副总理汪洋在哈尔滨会晤时提出中俄共同成立专门的工作组起草中俄在远东地区新的合作计划,该项计划将明确中俄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目标,同时特别强调明确责任和每个项目的落实期限,这表明中俄两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正在共同努力提高中俄在远东地区合作的质量和效率。

(2) 中俄远东开发合作中金融合作可能是未来最为重要的关键因素,两国企业均面临着融资问题,特别是收益时间较长、资金投入规模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融资要求较多,如果缺乏资金保障,双边经贸合作难以深化。2018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提出加强中俄金融领域合作,推动增加本币在贸易和投融资领域的比重,这一措施有利于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对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冲击。

(3) 中俄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人文合作的质量。此前中俄两国教育、文化和人员交往方面的合作在推动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该着重强调人文合作对于两国国家形象塑造以及建立两国民众互信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促进两国企业家、智库之间的深入交往,促使双方在不断交往中建立起企业界间的互信,同时提出互相关注的问题,在两国官方和学界的努力下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2017年3月开始实施的海参崴自由港电子签证政策为中国企业家往返俄罗斯提供了便利,根据俄滨海边疆区政府数据,截至2017年12月29日,已有6134名外国人获得电子签证,对电子签证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已有2388人申请。未来在海参崴电子签证政策运作成熟之后,俄罗斯应当将电子签证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整个远东、西伯利亚地区。

(4) 对于俄罗斯而言,远东开发是加强俄罗斯国家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弱化国家的调控能力,过于强调市场的自主性。这种思路不适用于俄罗斯开发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和人口密集度较低的远东地区,包括美国重要专家盖蒂和希儿的报告《西伯利亚诅咒》(The Siberian curse)中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相反,远东开发适用的路径应是加强国家(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国家制度创新和大量投入提到远东地区对于人口和资本的吸引能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应该注重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空间,在完成原始增长阶段后,中小企业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活力。也就是说,俄罗斯需要在强化国家作用与维持市场活力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的努力有可能为“最后的防线”这一人类最后有待开发地带带来新的历史性的突破。

Список литературы

1. Гемуева К. Реал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оптимизма?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ealii-ekonomicheskogo>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9.03.2019).
2.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ивлекает деньги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и почему это не всегда удается?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vedomosti.ru/partner/articles/2017/09/04/732285-gosudarstvo-privlekaet-dengi#/partner/articles/2017/09/04/732285-gosudarstvo-privlekaet-dengi>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7.04.2019).
3. Крившенко Сергей Филиппович: «Российское могущество будет прирастать Сибирью...»,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о русских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ах и мореходах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litresp.ru/chitat/ru/%D0%9A/krivshenko-sergej-filippovich/plavati-ro-moryu-neobhodimo/3>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1.03.2019).
4. Ларин В. Л., Ларина Л. Л.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эволюция взгляд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11. 311 с.
5. Минакир П. А. О концепци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2012. № 1. С. 7–28.
6. Чмыхало А. Ю.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Известия Томского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3. Т. 323, № 6. С. 178–183.
7. Минакир П. 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Азии: мифы, страх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8. 冯绍雷: “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 《俄罗斯研究》, 2013年第2期, 第10–23页。

9. 冯绍雷：“‘习特会’前后的中、美、俄三边互动”，《当代世界》，2017年第5期，第4–8页。
10. 张丽、张晓刚：“论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对远东地区的开发”，《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1. 南慧英：“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北方论丛》，2015年第5期。
12. 刘清才、齐欣：“‘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2期。
13. 参见远东发展部网站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s://www.minvr.ru/press-center/news/9773/>; Муратшина К. Г. Программ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егион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РФ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КНР на 2009–2018 гг.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значение, эволюция, риски //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7. № 417. С. 110–120.
14. 苏斯洛夫·丹，王超：“现阶段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合作问题研究”，《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6期。

References

1. Gemueva K. *Realii ekonomicheskogo sotrudnichestva Rossii i Kitaya – osnovaniya dlya optimizma?* (The realitie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 grounds for optimism?). Available at: <http://www.russiancouncil.ru/analytiks-and-comments/analytiks/realii-ekonomicheskogo> (Date of access: 19.03.2019).
2. *Kak gosudarstvo privlekaet dengi na Dalniy Vostok i pochemu eto ne vseгда udaetsya?* (How does the state attract money to the Far East and why is it not always possible?). Available at: <https://www.vedomosti.ru/partner/articles/2017/09/04/732285-gosudarstvo-privlekaet-dengi#/partner/articles/2017/09/04/732285-gosudarstvo-privlekaet-dengi> (Date of access: 17.04.2019).
3. Krivshenko Sergey Filippovich: «Rossiskoe mogushchestvo budet prirastat Sibiriyu...», M. V. Lomonosov o russkikh zemleprohodcah i morekhodah (Krivshenko Sergey Filippovich: “Russian power will grow through Siberia ...”, M. V. Lomonosov about Russian explorers and navigators). Available at: <http://www.litresp.ru/chitat/ru/%D0%9A/krivshenko-sergej-filippovich/plavati-po-moryu-neobhodimo/3> (Date of access: 11.03.2019).
4. Larin V. L., Larina L. L. *Okruzhayushchiy mir glazami dalnevostochnikov: evolyutsiya vzglyadov i predstavleniy na rubezhe XX–XXI vekov* (The world around us through the eyes of Far Easterners: evolution of views and ideas at the turn of the XX – XXI centuries). Vladivostok: Dalnauka, 2011. 311 p.
5. Minakir P. A. *Prostranstvennaya ekonomika* (Spatial economy), 2012, no 1, pp. 7–28.
6. Chmykhalo A. Yu. *Izvestiya Tomskogo politekhnicheskogo universiteta* (Bulletin of the Toms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3, vol. 323, no. 6, pp. 178–183.
7. 米纳基尔：“俄罗斯与中国在远东：臆造的恐惧与现实威胁”。
8. 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23页。
9. 冯绍雷：“‘习特会’前后的中、美、俄三边互动”，《当代世界》，2017年第5期，第4–8页。
10. 张丽、张晓刚：“论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对远东地区的开发”，《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1. 南慧英：“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北方论丛》，2015年第5期。
12. 刘清才、齐欣：“‘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2期。
13. *Vestnik Tom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Bulletin of Tomsk state University), 2017. No. 417. P. 110–120. 2017. № 417. S. 110–120.
14. 苏斯洛夫·丹，王超：“现阶段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合作问题研究”，《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6期。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е

Briefly about the author

Цуй Хан, д-р полит. наук,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г. Шанхай, КНР.
omelichkin.ov@mail.ru

Cui Han, doctor of politic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of Russian Studies, East China Pedagog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Образец цитирования

Цуй Хан.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е в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 Вестни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9. Т. 25. № 6. С. 122–129. DOI: 10.21209/2227-9245-2019-25-6-122-129.

Cui Han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e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Transbaikalian State University Journal, 2019, vol. 25, no. 6, pp. 122–129. DOI: 10.21209/2227-9245-2019-25-6-122-129.

Статья поступила в редакцию: 29.04.2019 г.
Статья принята к публикации: 11.06.2019 г.